

2015 年 10 月，頁 169-181。

外邦人的四重奏：評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

蔡嵐婷*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

近年臺灣「東亞海域史」及「海域亞洲史」研究，逐漸與國際接軌，邁向更開闊的時代。

猶記約莫十年前擔任研究助理時，為蒐集越南天主教研究相關資料，曾興起概略認識東南亞史的念頭，但在找尋中文書籍補充背景知識時，非常訝異於資料的欠缺，圖書館架上關於越南史的著作只有一本是臺灣人撰寫出版的。¹若說距離遙遠難以到達，或彼此長久不相往來，激不起研究的興趣似乎理所當然。但當時的臺灣社會卻已有 33 萬 7 千名移工，²更有為數不少的新移民。若以 2300 萬人口來計算，幾乎每天在路上遇到的 100 個人至少有 1 個出身東南亞。他們生活在我們週遭，距離如此切近，語言、思想、習俗居然在主流社會裡如此沉默，連歷史上、文化上與我們緊密相關的部分都顯得如此隔閡陌生，很容易在論述時被歧視甚或遺忘。

所幸在各種新興媒體的關注下，近年對於多元文化、多角化交流的認識，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1 梁錦文，《越南簡史》（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出版社，2004）。早期有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1986），陳氏為臺灣出生，但此書在日本出版。大陸的越南史研究較多，參考李新平，〈越南史百年研究概述〉，《文化研究》，2009 年 2 月（上旬刊），頁 230。

2 參考內政部，〈內政統計通報：95 年第 30 週（95 年 6 月底在臺外籍人士統計）〉：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list.htm>

已較十年前更為全面。教育部支持的許多共同研究計畫，也讓各大學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不必再孤軍奮戰，能攜手國際，相互交流。網路數位時代資料傳遞更為便捷，研究者們對外語史料的使用愈發得心應手，是以能進一步拋開民族主義的侷限和戰爭陰影的籠罩，有助於許多跨越國界議題的發掘和推展。重視東南亞語言教育的呼籲，也逐漸浮出檯面，撥雲見日。³

日本在共同研究和多國語言史料的運用上，一向是亞洲的佼佼者，近年在國際通力合作的氛圍中，展現了更卓著的成果。2005年至2009年，中島樂章、藤田明良、鹿毛敏夫、岡美穗子、山崎岳等教授，執行了日本政府補助的「東亞海域交流和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計畫，2010年至2012年進行了「西歐、中國、日本史料中的16至17世紀東亞海域史綜合研究」。⁴做為計畫研究成果，2013年1月12日，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召開「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交易與紛爭」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共發表8篇論文（報告）。⁵會議中發表的7篇論文，加上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鄭維中，〈「清朝征服臺灣」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一篇。由中島樂章教授撰寫〈序論——「交易與紛爭時代」的東亞海域——〉，構成《南蠻・紅毛・唐人》一書。⁶本書出版不久即受到學界的關注，撰寫新書介紹、書評或加以引用，例如《史學雜誌》、《海事史研究》、

3 何景榮，〈被高教無視的東南亞語〉，《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7339/1226029-%E8%A2%AB%E9%AB%98%E6%95%99%E7%84%A1%E8%A6%96%E7%9A%84%E6%9D%B1%E5%8D%97%E4%BA%9E%E8%AA%9E>；〈英語系太多 學者贊成轉型東南亞語系〉，《聯合報》，2015年10月11日，A1版。

4 詳細經過請參閱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399-401。

5 會議的摘要過程，見日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研究室網頁報告：

<http://haneda.ioc.u-tokyo.ac.jp/eurasia/112.html>

6 本書各篇論文，日文原篇名如下：中島樂章，〈序論——「交易と紛争の時代」の東アジア海域〉；山崎岳，〈ムラカ王国の勃興—15世紀初頭のムラユ海域をめぐる国際関係〉；中島樂章，〈1540年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と西欧式火器—朝鮮・双嶼・薩摩〉；岡本真，〈堺商人日比屋と16世紀半ばの対外貿易〉；鹿毛敏夫，〈ドイツ・ポルトガルに現存する戦国大名絵画史料〉；ルシオ・デ・ソウザ（翻譯 小澤一郎・岡美穗子），〈16~17世紀のポルトガル人によるアジア奴隷貿易—ヴィクトリア・ディアス ある中国人女性奴隷を追って〉；藤田明良，〈近世初期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情報伝達と言説生成—1665年オランダ船普陀山襲撃事件を中心に〉；鄭維中（翻譯 郭陽），〈清朝の台湾征服と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施琅の「台湾返還」密議をめぐる〉；岡美穗子，〈ポルトガル人のアジア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アユタヤ〉。

《南島史學》等等。⁷臺灣的歷史暢銷書《大人的日本史》作者，也將本書列在重要參考書目中。⁸

以下分三部分，先依章節介紹其構成概要，最後將閱讀心得以就教於方家：

一、序論及研究回顧

中島樂章先生的〈序論〉，不但簡明扼要介紹本書的諸篇論文，更是剛入行的初學者們，了解東亞海域研究領域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一盞明燈。他以輕快的節奏，先由南蠻、紅毛、唐人的語源談起，在第一部分揭示交錯於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連接東洋和西洋的各主要航線；第二部分回顧日本在東亞海域上的研究成果，說明研究趨勢；第三部分依研究主題的時代分為四期，簡介本書八篇論文。

尤其值得研究者寓目的是第二部分。日本對於東亞海域史以至南洋史的研究與開拓，至今已超過百年，中島氏將重要學者及其研究特色加以整理，更方便初學者入門閱讀。為方便本刊讀者，在此簡略整理摘要如下（僅舉出人名，書名、書目省略）：⁹

第一期：1900年至1945年

第一線的研究者，併用西歐、漢籍、日本史料的研究。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南洋史講座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東洋史講座的藤田豐八、桑田六郎；日本史講座的小葉田淳。

7 〈新刊紹介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海事史研究》，71期，2014年11月，頁88-90；嘉藤慎作，〈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史學雜誌》124:6，2015年6月，頁114；春名徹，〈【書評・紹介】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南島史學》，第82號，2014年12月，頁20-24。

8 涂豐恩，〈【大人的世界史】閱讀日本的方法〉(2015/05/24)：<http://gushi.tw/archives/8026>

9 以下由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12-19節略。

日本本土方面，日歐關係史岡本良知、海老澤有道、外山卯三郎、新村出；日中關係史秋山謙藏、藤田元春、木宮泰彥、川島元次郎、矢野仁一、石原道博等。

第二期：1945 年至 1990 年前後

日本戰敗後對外關係史研究轉趨低調，主要研究分為三大研究領域切支丹史、日蘭關係史、日中關係史。

切支丹史：松田毅一、岡田章雄、五野井隆史、高瀨弘一郎、岸野久

日蘭關係史：金井圓、加藤榮一、永積洋子、永績昭。

中日關係史：岩生成一、小葉田淳；田中健夫、武野要子。長崎貿易：山脇悌二郎、中田易直、中村質。

作者特別提到，此時期大航海時代叢書的刊行和歐文史料的翻譯也很重要。但多半各自發展專門領域，與後來的發展略有不同。

第三期：1990 年至現在

從對外關係史或兩國關係史發展為東亞海域史的時期，超越了以往日本學界日本史和東洋史的區別，轉向大規模的共同研究。

日本史方面：村井章介、荒野泰典

亞洲史方面：濱下武志、川勝平太

日明關係：伊藤幸司、橋本雄、鹿毛敏夫、紙屋敦之。

日清關係：松浦章、太田勝也、岸本美緒、上田信、宇田川武久、久芳崇武。

南歐史料（菲律賓）：伊川健二、的場節子、清水有子、平山篤子、高橋裕史

荷蘭史料：鈴木康子、松方冬子、木村直樹、石井米雄

東南亞港市國家：石井米雄、弘末雅士、坂井隆、菊池誠一

此外，本書幾篇論文的作者，如藤田明良、山崎岳、岡本真等，也廣泛運用各國史料進行歷史研究。¹⁰

¹⁰ 此處應該還要加上中島樂章教授自己。中島教授能以中文聽說讀寫，雖然自謙學習開始葡萄牙文不久，但在研究上，中國、日本、葡萄牙史料都運用自如。

〈序論〉第三部分，則以 Anthony Reid《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¹¹ 的基礎概念，進一步將本書討論的「貿易與紛爭的時代」，以約 60 年為一期，分為：第一期 1450 年至 1510 年；第二期 1510 年至 1570 年；第三期 1570 年至 1630 年；第四期 1630 年至 1690 年。作者整理出「海域亞洲」和「內陸亞洲」在 15 世紀前半朝貢體系的情形，比對「1570 年體系」¹² 貿易港口和貿易內容，可以看出顯著而關鍵的變化，尤其東亞海域的貿易規模急速擴大，參與的人們身份、背景也各異，並非固定團體，不只是歐亞貿易，亞洲海域各地之間的貿易也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強調此書的理念，並不是顯現歐洲中心主義或亞洲中心主義，而是從各種族 (ethnicity) 的人們留下來的證詞，從多元視角各方面來討論，希望描繪出東亞海域「貿易與紛爭的時代」更全面的情況。¹³

二、各篇論文概況

本書 8 篇論文，依章節次序簡介如下：

山崎岳，〈馬六甲王國的興起——十五世紀初環繞馬六甲海域的國際關係〉(頁 35-98) 描述港市國家馬六甲王國的興起，以該國歷史對比漢籍、葡萄牙史料，說明以華人交易圈為主、具備海盜性格的海市國家獨立之後，在各大國權力夾縫間，依附朝貢體系的生存之道，以及王權形成、華人勢力沒落的過程。在結論中，作者特別提到：「歐洲人到來之前的東南亞海域，基本上和到來之後一樣，都是以通航、貿易實力論的弱肉強食世界，並非後世歷史家夢想中的桃源之鄉」¹⁴ 春名徹的書評裡，提示了本篇另一種讀法，他認為若能將馬六甲王國的外交關係，與明鄭政權周旋在荷蘭與清朝之間的處境相對照，更富趣味。¹⁵ 對臺

11 Anthony Reid 著，孫來臣、李塔娜、吳小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2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26。

13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32。

14 山崎岳，〈ムラカ王国の勃興—15世紀初頭のムラユ海域をめぐる国際関係〉，頁 78。

15 春名徹，〈【書評・紹介】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

灣的讀者而言，切身感觸更深，似乎能以古鑒今。

中島樂章，〈一五四〇年代東亞海域與西歐式火器——朝鮮、雙嶼、薩摩〉（頁 99-176）說明歐洲火炮系統在東亞海域的貿易與紛爭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討論歐式鐵砲傳到日本的年代及其路線，也討論了朝鮮漢籍所載 1544 年漂流朝鮮的船隻搭載佛郎機砲的可能性。作者運用中文史料將歐洲火器清楚區別成大砲和鎗（銃）兩類，以圖像輔助說明，也透過細心整理《覽餘雜集》走私船、日本船上裝載火器的數量和紀錄，探討銃砲在東亞傳播的路徑。作者參考比對日本和西歐史料，指出薩摩東鄉氏派遣家臣持「番銃」經過中國浙江的雙嶼，1549 年黑川崎之戰，則是日本第一次將火繩銃用於戰爭當中，也可以推論火繩銃曾由雙嶼輾轉傳到南九州以外的地方，並不只由種子島單一途徑傳播到日本各地。

在此似乎可以就中國方面的情形略做補充，就其他研究資料來看，歐洲火器如佛郎機銃，在明嘉靖初年傳入中國，不久已能仿製，嘉靖末年遠至遼東都已量產使用，高達 1443 門。¹⁶東海往來頻繁，物品、人員和技術相當可能透過多方向的角度傳播或傳遞，並非單一國家或單一路徑可以解釋。

岡本真，〈堺商人日比屋與十六世紀中期的對外貿易〉（頁 177-202）以堺市的知名切支丹商人日比屋了珪家族為例，研究商人在日明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在助野健太郎和松田毅一的研究基礎上，運用了傳教士 Antonio Prenestino 的書信，更加深入研究，歸納出日比屋家族貿易的共通三個特徵：堺市商人的身分、與本願寺聯合、與大內氏相關等三點，說明日比屋家族進行遣明船貿易、島嶼貿易和外來船貿易的連續性，並旁及其家族女性與宗教生活。本文除了日比屋家族史之外，從論文中援用的資料，例如名物集和茶會記等，也可以一窺當時富商生活的器物和場景。

海域——』》，頁 21。

¹⁶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3 分，2004，頁 576。

鹿毛敏夫，〈德國、葡萄牙現存的戰國大名繪畫史料〉（頁 203-228），從十七世紀歐洲繪畫，找到幾幅沙勿略向日本戰國大名傳教相關作品，佐以文獻考證的同時，也具體呈現當時西方藝術作品中的日本領主形象。作者親自走訪歐洲，遠赴里斯本的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Coimbra）的大教堂，欣賞該堂沙勿略和大友宗麟會面的繪畫（1640 年），也到曾為耶穌會總部的聖洛克堂（Igreja de São Roque）找到沙勿略在日本傳教的數幅圖繪（約作於 1619 年至 1622 年），例如在帶著隨從彌次郎（Yajiro）上京，在山口大道寺與佛僧的討論及佈道，以及在豐後府內治癒病人的神蹟等。作者接著到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波梅爾斯費爾登（Pommersfelden）城，收藏了一幅沙勿略與「日本之王」會面的畫像（1641 年），學者推測畫中之人即是大友宗麟。文中指出畫家們或許也參考了天正遣歐使節團獻給教廷的畫作、物品，以及十六世紀後半傳入歐洲的屏風，但畫面上呈現的大名，服裝打扮較接近印度王而非日本戰國領主（大名）。本篇除了運用非文獻史料之外，更可以透過作者拍攝的畫作，看到當時的歐洲人對「日本國王」衣著和住所的想像。在本書的結語裡，中島樂章先生也舉出一幅他自己在里斯本看到，描繪沙勿略在日本時期的畫作，標題是「（沙勿略）以貴人了珪侍從的身分，前往京都的旅途」（Viage a Kioto en el sequito del noble Ryokei），¹⁷與 210 頁沙勿略和彌次郎上京圖相較，這裡的「貴人了珪」完全是印度人的打扮，說明當時歐洲畫家的想像中，日本人和印度人實在難以區分。

這裡也提示了一個可能性，若藝術史研究者拿在日本的大友宗麟畫像與歐洲繪畫中的大友宗麟對照，甚至將禁教後流放到馬尼拉的高山右近畫像、塑像等也進行比對，配合東亞各國及歐洲人記錄中戰國大名在形象的文字描述，在數位視覺科技發達的今日，的確是值得開發的領域。反過來說，在歐、亞各國紀念沙勿略的聖堂、塑像、畫作也非常豐富，就目前所知，分佈的地點包括葡萄牙、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度甚至捷克，若將各地的畫像塑像的包括的元素、創作的時代背景加以分析，也許能找出一些超越文獻史料的意義。

17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404。

Lucio de Sousa (小澤一郎、岡美穗子譯)，〈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人的亞洲奴隸貿易——追溯中國女奴 Victoria Diaz 的經歷〉(頁 229-282) 先描述 16 至 17 世紀葡萄牙人在東亞的奴隸貿易經濟概況，主要交易據點在澳門，奴隸的身份則分三階段有所不同，起初時在中國，1570 年至 1592 年以日本為主，1592 年至 1598 年因為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朝鮮奴隸取代日本奴隸成為大宗。1598 年以後，由於耶穌會士的要求和協議，奴隸交易的地點由澳門轉向馬尼拉。

本文的主角是一位被稱為 Victoria Diaz 的女僕，她在 1550 年至 1555 年之間出生於中國，被拐賣到日本，從馬六甲到果阿，最終抵達歐洲成為富商 Henrique Milão 的奴僕，在廚房工作，因為主人一家被控祕密信奉猶太教，遭到異端裁判所審訊。她在 Milão 家工作超過 30 年，1602 年重獲自由，卻仍然選擇在 Milão 家中繼續服務，而且在 1607 年的審訊中拒絕告發自己的主人。審判結果是她無法辨識猶太教為「異端」，因此赦免其罪，但要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再教化。在 1609 年，以協助主人家的逃獄計畫為由，她又受審，最終仍在 1610 年 4 月 10 日無罪釋放，1611 年與主人一家共同逃出葡萄牙，到荷蘭展開新生活。

或許我們只能從有限的敘述，讀到這位女士人生波瀾中一小部分的經歷和感受，但若將這個無意中被留存下來的故事，與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¹⁸ 相對照，或許也能思考當時被帶到歐洲的中國人，突如其來被迫身處異鄉，缺乏對周遭環境的認識，他們要如何面對遙遠的異域世界和自我定位呢？胡若望因為「瘋狂」而遭到監禁，Victoria Diaz 卻因為忠誠而選擇了與主人家同進退，她做為「奴隸」到達歐洲社會，最後是否反而尋得安身立命之所？

藤田明良，〈近世初期東亞海域的資訊傳遞和言論形成——以 1665 年荷蘭船襲擊普陀山事件為中心〉(頁 283-318) 觀察到東亞海域資訊傳遞的特殊現象。作者比對 1660 年代荷蘭船襲擊普陀山事件在日本《長崎夜話草》、中國《(康熙) 南海普陀山志》、《海國見聞錄》、《(乾隆) 南海普陀山志》、《臺灣

¹⁸ 史景遷 (Jonathan Dermot Spence) 著，陳信宏譯，《胡若望的疑問》(臺北：時報文化，2011)。

外記》的記載，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城日記》的記錄。普陀山遭到荷蘭人襲擊實際發生在 1665 年 5 月，但在各書上的故事，卻結合了數百公里外長崎的荷蘭船起火事件，以及發生於 1666 年，相隔數千公里外，巴達維亞港荷蘭船重大火災的事件。中國流傳的敘述裡甚至加上許多顯神蹟、得報應的內容。三個原不相干的事件，在海商的口耳相傳裡，演變成具有因果關係的故事。雖是人云亦云、耳食之言的成分較多，但探討故事脈絡化過程背後的心理因素，一方面來自普陀山做為保佑航海的信仰中心引發的神蹟想像，一方面也荷蘭船在東海上恣意掠奪的暴行有所關聯。

本篇與前述山崎岳的論文的特點，同樣在於比對多語言、多角度史料後，重新發現那些隱藏在被省略、被遺忘、被融鑄和被強調的論述（們）背面的歷史意義。因此，嘉藤慎作曾如此評價本書：「在同樣的時代，同樣場所生活的人們，以各自的視角眺望著亞洲海洋，用各種語言把亞洲海域的樣貌寫下來傳給後世。這些流傳下來的歷史史料，就算是目擊了同樣的事件，仍因為敘述者的文化背景、立場不同，往往展現出不同的內涵。這樣的情況下，若單從一種語言的史料來檢視，很難將歷史的實況充分描寫出來。對多種語言的史料毫無遺漏的——加以探討，重新認識包含各種視角的、複合的東亞海域史，是本書的特色。」¹⁹

鄭維中，〈「清朝征服臺灣」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頁 319-366）。本篇是一翻案文章，在作者〈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²⁰的基礎上，更為聚焦討論在康熙年間征臺之役前後，東海和南海的貿易狀況，以及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未接受施琅密議的原因。當鄭氏已有降意時，施琅為換取維持福建貿易獨佔權，向英人、荷人提出返還臺島之議，企圖迫使中央維持其他地方的海禁，福建商人也能透過與東印度公司掌握的臺灣貿易，在南洋商品上獲得更高的利潤，足以與廣東—澳門航路對抗。但當時康熙皇帝執意開海，

19 嘉藤慎作，〈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史學雜誌》124:6，2015 年 6 月，頁 114。

20 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第 61 卷第 3 期，2010，頁 35-74。

再加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中國貿易不太感興趣，結果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也從國際貿易轉運點變為中國沿海移民、開墾的區域。施琅與東印度公司的祕密協議，未曾出現在中文史料內，唯有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記錄，才能了解當時東亞海域複雜交錯的貿易權力。這份史料和作者的分析，相當程度顛覆了施琅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論述中塑造出的形象。

岡美穗子，〈葡萄牙人的亞洲貿易網絡與大城〉（頁 367-398），透過觀察東南亞和東亞交易、活動的樞紐大城（Ayutthaya，或譯阿瑜陀耶）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發展，說明葡萄牙人並非如以往認知的，在東印度公司貿易盛行之後，就從東亞市場被驅逐，而是持續在亞洲進行貿易活動。尤其在那萊王（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นารายณ์、Narai）時期，大城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十分警戒，他利用葡萄牙船行駛大城到澳門的航路，以葡萄牙人和當地華商為其代理人，透過王室人士、翻譯人員以及耶穌會士做為媒介，與澳門當局建立貿易和借貸關係，一直到十八世紀泰沙王時期（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อยู่หัวท้ายสระ、Thai Sa）仍然維持貿易。作者極其細心整理澳門的葡萄牙人向大城王朝借款、返還的相關記錄，以此推測葡國船隻仍持續在中國沿海的航線上活動著。

事實上，中國方面的禁教史料與本篇描述的葡萄牙人持續在東亞貿易的情況，亦可以互相補充，至少在禮儀之爭前，耶穌會士能夠從澳門前往中國各地，也不時獲得補給物資。然而在禮儀之爭後情況有所轉變，1725 年葡萄牙國王派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e Menezes）使華無功而返，1727 年（雍正五年）海禁廢除，是讓澳門貿易衰微的關鍵。²¹此一時期，恰在澳門當局最後返還大城國王借款的 1723 年隨後不久。因此或許也能推論葡萄牙人在東亞的勢力雖然飽受打擊，真正走向衰微，是 1727 年以後受到中葡關係惡化所致。

²¹ 黃啟臣，〈麥德樂使華與中葡關係〉《行政：澳門政府雜誌》，40 期，1998，頁 520。

三、綜合述評

本書內容甚為豐富可觀，各篇運用的史料，除了中文、日文、韓國漢籍之外，還涉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德國等地各語言的資料，其中包括文獻和物質史料。在此必須申明，西歐史料對於東亞海域如此重要，並非因為歐洲中心的思考，而是如同編者在〈序論〉提起的：「西歐史料的敘述者多半是實際在這個海域航海、貿易、傳教的人們。他們做為來到異文化世界的外來者……對於海域社會的日常性，往往留下珍貴的證詞」。²²

此外，作者們非常努力從缺乏統計數據的記載中，整理歸納出具說服力的論點，製作使讀者們容易了解的地圖、世系圖。除了論文本身展現的多重視角和開創性，出版團隊也極細心，例如鹿毛教授文中提到的三幅重要畫作，中島教授做為論述佐證的紅白頭巾船員畫作、火繩銃畫作，都以全彩印刷放在全書前數頁，增添本書的可讀性。在凡例中也說明，若雙方記載的曆日不同，會附記互相對照的年號和日期。最重要的是，各篇論文的作者們，不僅在文獻上有深厚的功底，也與研究團隊不辭辛勞，行萬里路，為尋找能互相印證的史料不遺餘力，不僅在日本調查相關史跡，還前往中國、葡萄牙、西班牙各地搜集史料，當然也來到臺灣，和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學術活動，參訪臺南。本書論文雖未及於越南，但團隊也曾前往越南進行海域史的相關調查。²³

若要吹毛求疵，僅可以從本書找到一些值得商榷的小地方：首先在〈序論〉中的「臺灣帝國大學」名稱出現兩次。²⁴帝國大學在臺北成立初期，確曾討論過是否命名為「臺灣帝國大學」，不過最終為了和在日的其他帝國大學名稱統一起見，正式成立時就已命名為「臺北帝國大學」，亦即現今之臺灣大學。²⁵再者，本書依照日本學界書籍慣例，不在西文人名、地名的片假名拼音第一次出

²²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32。

²³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402。此處提及岡本真教授在天草考察豐後的切支丹遺跡，其尚未發表的成果十分令人期待。

²⁴ 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12、頁 14，「台湾帝国大学」。

²⁵ 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研究統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http://www.lib.ntu.edu.tw/node/572>

現時括號加附原文，雖然可以依照日文假名拼音檢索或拼回原文，然而做為一個母語並非日語的讀者，閱讀上相對困難，例如在頁 307 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拼音為「バタヴィア」或許是忠於作者引用的原著（村上直次郎的版本是《バタビヤ城日誌》，藤田氏引用的是他與八百啟介共同翻譯的新版《バタヴィア城日誌》），²⁶但在同一篇論文，頁 308 的「巴達維亞港」拼音是「バタビア港」。即使在日文拼 Batavia 時兩者通用，但不熟悉史料和日文拼法的讀者，可能會產生兩者是不同地方的錯覺；另如葡萄牙研究者 Lucio de Sousa，在目錄和其論文首頁都只出現片假名拼音，必須翻到最後執筆者介紹頁面，或是從註腳的參考資料裡面才能找到這位作者的原名。若本書在某些地方稍加標明原文或簡略說明，或許更能嘉惠以其他語言（中文、西班牙、葡萄牙文）為母語的讀者檢索及閱覽。最後，在 2013 年舉行的國際會議上，幾位重量級學者對於東亞海域交流史的觀念和期許，僅載於會議紀錄報告網頁，未能附錄於本書，甚為可惜。²⁷

總而言之，本書足以呈現在全球史浪潮裡，多彩多姿的東亞海域，在歷史上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不但是重視多元視角的研究成果，亦可做為人文社會科學團隊共同研究的典範。最後借用本書編者在〈序論〉中的浪漫譬喻：

通過「南蠻」、「紅毛」、「唐人」以及「和人」的交流、競爭和合作，構成了東亞海域「交易和紛爭的時代」。「南蠻」、「紅毛」、「唐人」、「和人」有如共演四重奏(quartet)，一開始雖由唐人演奏主旋律，而「南蠻」、「紅毛」、「和人」卻不僅僅是伴奏而已，他們也有時也擔任主旋律或對旋律。所有人都在東亞海域的舞臺上一同表演這首重奏曲(ensemble)。比起優雅的和諧音律，更能引人駐耳傾聽的，卻是那激烈的不諧和音。²⁸

身份與文化的對立交織，隱顯紆直，複雜錯綜，如餘音繞樑，數百年未已。快

²⁶ 村上直次郎譯註，《抄譯バタビヤ城日誌》（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會，1937）；藤田明良，〈近世初期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情報伝達と言説生成—1665年オランダ船普陀山襲撃事件を中心に〉，頁 315，註 28。

²⁷ 日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研究室網頁報告：
<http://haneda.ioc.u-tokyo.ac.jp/eurasia/112.html>

²⁸ 中島樂章編，《南蛮・紅毛・唐人——十六・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頁 31。

慢有序的四重奏裡，邦國之辨、主從之別，一齊陶冶成今日的大千世界。扣人心弦、發人深省的，是互動激盪的過往，而不是絕對二元的是與非。澎湃激昂的海上冒險，透過歷史學者們的努力發掘與傳承，轉化成能並肩聆賞、共同懷念的記憶旋律，彷彿一曲又一曲動聽的樂章。



圖一：馬六甲的沙勿略與彌次郎像²⁹

²⁹ 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古偉瀛教授提供。